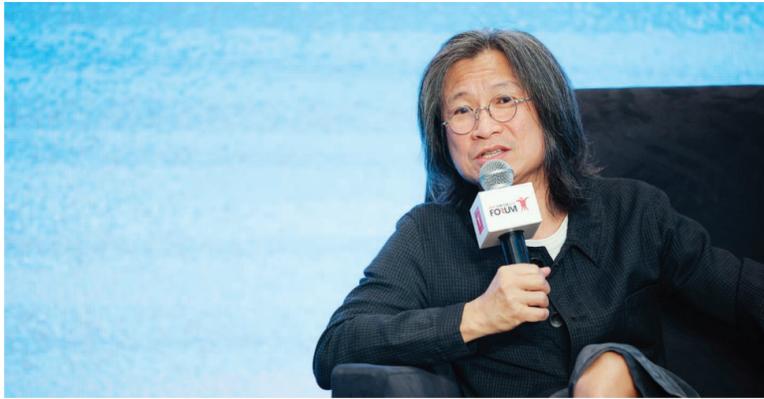


# 陈可辛 呈现一个温暖世界

本报记者 何玉新



陈可辛访谈  
这场戏好或不好  
要看它是否感人

记者:《甜蜜蜜》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深入人心的镜头,能否回忆一下拍摄时有哪些难忘的瞬间?

陈可辛:李翘在美国看到豹哥离世,首先她笑了一下,然后才哭,这个场景拍了好多条,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一条。既然第一条就那么好,为什么还要拍那么多条呢?拍第一条的时候,我没想到张曼玉会这样演。我觉得她最好看的就是没有表情,眼泪流下来因为她有一种强悍,当她演脆弱的时候,又很自然,这是与生俱来的,学表演都学不来的。而她突然笑了一下,我就蒙了,我说不行。她跟我解释,我说我明白,我完全理解你那个笑的动机,但就是觉得你在演,有演的痕迹。我们拍了八条,她说她真的哭不下去了。后来剪片子的时候,第一条虽然还是没有绝对地说服我,但我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更让我感动的,我想把那个笑剪掉,但是也剪不掉,只能认了。最后大家都喜欢这一段,所以也说明,导演不一定是对的。

记者:那么后来您认同这个笑了吗?还是觉得人去世了,就应该哭?

陈可辛:其实之后的很多年,我都不理解、不明白。直到我拍《金鸡2》的时候,在配音间里配音,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柯受良去世了。柯受良是我和吴君如的好朋友,而且他和君如的关系更好。我把君如叫到外面,两手抓住她的肩膀,我说小黑走了。她突然间用她在电影里面那个角色的表情,“嘿嘿”笑了一下,笑完才哭。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她突然会哭,那个笑跟张曼玉那次的笑一样。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不明白。又过了20年,今年我爸爸去世,我在半夜3点接到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也不是哭。我觉得怎么可能?我爸爸的身体很健康,这太荒谬了,简直是一个笑话……

记者:您拍的爱情片特别细腻,尤其是表现女性内心的时候,特别能打动人心。作为一名男性导演,您是怎么做到的?

陈可辛:大家说我拍的是爱情片,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关系片,我不太会拍爱情片。我也没有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拍,只是站在人的角度,或者我作为男性去看女性的角度。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封建,没有那么大男子主义,所以我拍女性会拍得比较到位。

可能有人会说,你不就是在煽情吗?其实我觉得不是,我喜欢感人。我看电影,我喜欢找到我能哭的地方。看剧本的时候,或者跟编剧聊剧本的时候,我会想到这里我一定会哭。这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标准,这场戏能不能过,好还是不好,要看它是否感人。

记者:您妻子吴君如是喜剧演员,您怎么看待喜剧?

陈可辛:说到喜剧,我到了现在这个人生阶段,就可以回家问君如了,好不好笑?因为我自己的笑点跟她也并不一样的。喜剧本身就是悲剧,喜剧演员都有很灰暗的一面。其实我也喜欢喜剧,但是我不爱搞笑,我搞不了笑,这是很吃亏的地方。搞笑才是最大公约数,喜欢看喜剧的观众最多。

(图片由上海电影节提供)

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著名导演陈可辛参加电影学堂大师班,畅谈了自己与电影的分缘。在将近40年的电影生涯中,陈可辛游走于内地、香港和国际影坛,执导了17部作品,监制了近40部作品。从儿时跟父亲走进片场,到在电影院里迷上了看电影;从电影公司的暑假工,到助理、后勤、监制;从执导处女作《双城故事》,到如今拍摄“全世界人都看的中文剧”。于陈可辛而言,电影或许是童年往事里懵懂的梦,是青春年少时的火,也是相伴人生的一叶扁舟。他说:“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人生必然会碰到很多烦恼,遇到很多难题,但乐观在于当下,当你乐观时,当下就快乐了。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你就想象结果是最好的,因为起码你把它当下赚了。这就是我人生的态度,拍电影的态度。”

受父亲影响爱上电影  
拍《金枝玉叶》票房夺冠

陈可辛生在一个电影之家。父亲陈铜民是泰国华侨,上世纪60年代到香港,在国泰、邵氏等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宣传,也做过演员训练班的主任。父亲常把自己的梦想讲给儿子听,并带陈可辛去片场看拍电影、去电影院看电影。童年时光在陈可辛的记忆中留下许多温暖画面,他说:“我小的时候就看过一些完全看不懂的电影,一直在这个氛围里面长大,所以跟我爸爸的关系特别好,像朋友一样。”

几年后,陈铜民为梦想辞职,独立拍电影,陈可辛成了父亲电影中的童星。当时香港电影市场竞争激烈,电影人的社会地位也特别低。没过多久,陈铜民事业失败,带着家人移居泰国曼谷。小小年纪的陈可辛仍喜欢电影,平日自己攒钱,到暑假就跑回香港去看电影。

父亲知道儿子喜欢电影,但这条路太难走,甚至可以说危机重重,所以对儿子提出一个要求,“千万不要碰电影”。有一次一家人去度假,住在海边的高级酒店,陈铜民觉得酒店经理是一个很舒适的职业,住在酒店,吃在酒店,不用受苦受累,没有那么大的工作压力,所以想让陈可辛学酒店管理。

1980年,陈可辛听从父亲的安排,前往美国洛杉矶上大学,读酒店管理专业。但只念了一个学期就熬不下去了,偷偷换成了电影课程。1983年放暑假,陈可辛瞒着父亲回香港,在嘉禾电影公司打工,一干就再也舍不得走。吴宇森执导动作电影《英雄无泪》需要泰语翻译,陈可辛获得机会,并参与了编剧及统筹。随后,他又担任了蔡澜等人的副导演和助理制片,正式步入电影行业。

1991年,陈可辛的导演处女作《双城故事》上映,该片由曾志伟、谭咏麟、张曼玉主演,被香港导演协会选为最佳影片。渐渐有了些名气的陈可辛与几名年轻导演一起创立了一家小型电影公司。公司要求陈可辛完成一份“命题作业”,他回忆说:“我之前的电影虽然也会考虑票房,但自主性比较强,而这次要为张国荣量身定做拍一部电影,讲的就是明星生活,是好莱坞电影的套路,王子和灰姑娘的童话故事,难点也在于此——我从小到大都不爱看童

话,这种爱情跟我的爱情观不一样。”

尽管有难度,陈可辛还是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他监制并执导了由张国荣、袁咏仪、刘嘉玲等主演的爱情电影《金枝玉叶》,票房达到3000万港元,拿下了暑假档票房冠军,跻身香港年度十大卖座电影,获得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提名。陈可辛有了一种功成名就的感觉,“那阵子我是不用走路的,因为整个人都飘了起来……”

然而世事难料,《金枝玉叶》取得成功的同时,公司却濒临倒闭,而另一家大公司开出的收购条件,却是必须要拍《金枝玉叶》的续集。陈可辛只能答应这个完全不在计划中的续集,“我不知道该怎么拍,因为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想来想去,只能拍童话故事之后男女主人公怎么继续生活,拍他们的同居、婚姻关系,把那份快乐延续下去。”同时,陈可辛也提出一个条件——再拍一部比较文艺的电影,那就是《甜蜜蜜》。那家大公司勉强答应,但只同意给他几百万元资金。

因为担心公司变卦,陈可辛决定先拍《甜蜜蜜》。可是《金枝玉叶2》要赶在当年的暑假档上映,所以《甜蜜蜜》拍到一半时只好暂停,他又忙着去拍《金枝玉叶2》。

遭受冷遇无人问津  
反而成就了《甜蜜蜜》

“过去我们在香港拍戏很难,很多场所都不让我们拍,但这次却很顺利,因为《金枝玉叶》成功了,一些大酒店都让我们随便拍,拍的时候很爽。”陈可辛说,那个时候香港电影的周期很短,一个多月就能拍完一部戏,五六天就能剪辑完,一年能拍好几部戏。匆匆结束了《金枝玉叶2》的拍摄,他又接着去拍《甜蜜蜜》在纽约的那一部分。这时《金枝玉叶2》开始疯狂地做宣传,十几年没联系过的朋友都给他打电话要电影票。谁知片子上映后大家都傻了,不仅票房失利,影评人也是一片嘘声。

在陈可辛看来,两部《金枝玉叶》的命运其实是完全相反的,“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命运,没有任何导演想去拍一部不好的电影,只要他拍了,他就会努力把戏拍好,但灵感来不来,却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从纽约回到香港,陈可辛遭受冷遇,这反而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剪片子、做后期。“我像是被打入了冷宫,跟我的剪辑师一起关在房间里剪片子,很沮丧,一个多月也没有人搭理我。没人关心《甜蜜蜜》的档期,没人追着我问什么时候上映……”

《甜蜜蜜》并没有首映式,第一次试映是午夜场,深夜11点多,在香港最大的一家电影院,位于尖沙咀天星码头。“半夜一点多散场以后,我们几个人走路去附近一家咖啡厅喝东西,同时也想自我检讨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可以修改、调整的地方。”那一夜让陈可辛至今难忘,“本来十几分钟的路,我们走了一个半小时,因为一路上每个认识的人都会拦住我们,说他们有多喜欢这部电影!”

《甜蜜蜜》大获成功,陈可辛获得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经历过挫折与冷

遇,这一次陈可辛没有像《金枝玉叶》成功时那样被冲昏头脑,而是多了一份踏实,“我知道我还能留在这个圈子里,继续拍电影。”

曾有人问陈可辛,在电影《甜蜜蜜》中,李翘和黎小军在香港相遇、相爱后分手,几年后又在纽约街头意外重逢,真实世界里的情况,会有这样的幸运吗?并据此质疑陈可辛的电影逃避现实,向商业妥协。陈可辛坦言,自己的电影经常会游离在“现实”“残酷”和“温暖”“乐观”两种对立情绪当中,有时候确实会碰到人性的阴暗面,人生的不幸,但是他也相信,那些血淋淋现实背后的问题都可以解决,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就只能拍问题被解决的这种结局。”

对世界成熟的思考、对人性有效的认知,成就了陈可辛电影中温暖的基调。“这几年我听到一个词——温暖现实主义,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的日子可以过得很难,但我又有温暖的信念,相信明天会更好,可能因为我是射手座,特别乐观。甚至在我看来,不幸福也是幸福。拿我自己来说,这一辈子所有的经历,苦的、甜的、酸的、辣的,我觉得都是好的,因为如果没有过去的好,就没有今天的好。”

一直有一种危机意识  
一直在顺应市场变化

虽已年过花甲,但陈可辛依然保持着“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天真与感性。“我一辈子都这样,我仍觉得自己是少年。很多东西我都不懂,也没有经验,但我喜欢那种感觉。我的弱项是技术,我只想讲故事,讲情感和人物,对于场面、特效、动作、炫技的镜头完全没有兴趣。好在我还有一个优点,从主观上说,我觉得我的审美还是不错的。”

谈到对导演这个职业的理解,陈可辛开玩笑说:“导演其实是一个最容易的工作,因为在电影行业里,无论是演戏、写剧本、摄影还是剪辑,都需要有专业知识,但导演可以什么都不懂、都不会,导演就是一个把所有人‘码’在一起去创作,然后再去做选择的人。”

1998年,陈可辛为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执导了爱情电影《情书》。随后几年,他又执导了歌舞片《如果·爱》,古装片《投名状》,动作片《武侠》,剧情片《中国合伙人》,体育片《夺冠》等一批电影。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陈可辛没有沿着《甜蜜蜜》那种文艺片的道路一直走下去?陈可辛解释说:“电影永远都不是一个特别赚钱的行业,能够回本已经很难。大家看到的票房数字,对我们从业者来说,压力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一直有一种危机意识,一直在顺应市场的变化。而且越成功压力就越大,因为大家对你的期望就会更高。当然我也有原则,就是电影一定要好看。如果这个电影不好看,对导演的损伤比不卖钱、口碑差都要大,观众会记一辈子。不过有一点我做到了,我拍的每部电影,无论大家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无愧于心。”

在被问及“选择演员的标准有哪些”时,陈可辛的回答非常坦诚:“首先当然要有明星,因为没有明星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电影,所以我就拍明星。”他认为拍明星是一门功课,要找到明星的特点,拍出别人没有拍过的那一面。从《金枝玉叶》中的张国荣、袁咏仪、刘嘉玲,到《甜蜜蜜》中的黎明、张曼玉,再到《投名状》中的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众多明星出现在陈可辛的光影世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明星之外,他对演员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必须懂得表现“脆弱”。“无论这个人多么坚强、多强悍,我也要求演员演出这个人物脆弱的一面,因为再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陈可辛希望年轻导演都能立足中国,找到好题材,“中国的市场很大,能够提供这样的资源。中国也有很多好故事,那为什么我们不去拍这些大家都能共情的中国故事呢?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也好,形式也好,都是一个桥梁,只要我们的内核——中国文化的东西保留下来,就可以搭起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找到一个结合点,把中国的文化输出出去,把中国的故事拍给全世界看。”

陈可辛

1962年生于香港,著名导演。电影代表作《金枝玉叶》《甜蜜蜜》《如果·爱》《投名状》《武侠》《中国合伙人》《夺冠》等。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华鼎等奖项。

讲述

## “津味儿话剧”自成体系,用天津方言讲天津故事 话剧舞台让我欢喜让我忧

口述 张艳秋 整理 郑祖元

张艳秋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她曾先后主演了《家》《茂陵封侯》《北平1949》《关系》《日出》《雷雨》《风华绝代》《花蕊夫人》《相士无非子》《榆树下的欲望》《母女春红》等话剧,获得过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话剧金狮奖、中央戏剧学院首届学院奖(表演奖)等奖项。她把一生的热爱献给了话剧舞台:曾忍着母亲离世的悲痛,将活波可爱、能歌善舞、追求爱情的茂陵公主呈现给观众;也曾不断探索中将曹禺先生笔下的陈白露刻画得淋漓尽致。一路走来,她不为诱惑所累,只为艺术而生。而今已过知天命年纪的她,更加珍惜每一次登上舞台的机会,也更愿意为年轻的话剧演员搭建平台,继续传承“津味儿话剧”。

零基础考入天津人艺学员班  
30岁第一次演女主角

我出生在汉沽,从小爱看电影,爱唱歌,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高中毕业后我考入汉沽税务局,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直到有一天,上中学时教音乐的林世辉老师得知天津人艺准备招收学员,立即告诉我,鼓励我报名,重新点燃了我为当演

员的梦想。

我第一次走进天津人艺大院,内心充满激动、崇拜,但是,当我看到那么多条件优秀的俊男美女都在候考时,顿时没了底气。我准备了朗诵和舞蹈,因为没受过专业训练,朗诵发挥得并不好,舞蹈跳得也特别僵硬。我觉得太失败了,肯定会被淘汰。老老实实地回单位上班。汉沽文化馆的牛老师鼓励我,帮我在税务局传达室找到了复试通知书。也许是运气好,我又顺利地通过了复试。三试时,我精心准备了一段朗诵——电影《人证》中的独白片段,把自己感动得流泪,也让作为考官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们动容。

接下来还有四试,考验学生的即兴表演。冉杰教授看出我性格含蓄温和,像小绵羊一样,便给我出了一道难题,让我表演一个在公园丢了孩子的母亲,表现一种着急的状态。老师不喊停,我就要演下去,也不知道哪来的激情,我疯狂地喊着孩子的名字到处寻找,最后急得蹲下身大哭起来。这一哭,终于让考官看到了我身上隐藏的表演潜力,为我进入天津人艺铺平了道路。

那一年是1987年,我们那届一共招收了十五名学员,七个女孩、八个男孩。中央戏剧学院的冉杰教授、田震琨教授,天津人艺的话剧表演艺术



舞台上的张艳秋

家常汝言老师都为我们付出了心血。我们学的课程和中央戏剧学院一致,带我们班的台词老师同时也带巩俐所在的班。

1999年,我们排演话剧《军号响了》,我第一次演女一号。这个角色要从我七八岁演到四十多岁,而那时我刚刚30岁出头,感觉上下都够不着。排练时我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再加上孩子小,精力达不到,每天特别着急,整个人处在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晚上常常失眠,想着怎么念得更准确,逻辑重音在哪儿,潜台词是什么意思,跟对手演员怎么交流,戏怎么接上,再加上形体表演……处处都要考虑到。再加上半月之后,我的嗓子

失声了,现在回头想一想,就是急出来的火,不是喝水少。

艺委会的老师们来审查这部话剧时,纷纷夸奖我:“哇,艳秋第一部戏就这么亮眼,在台上光彩照人,跟老演员搭戏搭得也好!”老师们的肯定让我有了自信,一下子找到了感觉。后来我们这部戏到北京演出,冯小刚导演看过之后,将其改编成电影《集结号》。

在舞台上塑造不一样的陈白露  
培养本地演员传承“津味儿话剧”

在舞台上这么多年,我演得最辛苦的角色,当数曹禺名剧《日出》中的陈白露。2005年夏天,天津人艺排演话剧《日出》。剧院对陈白露这个角色要求很高,任鸣导演认为,《日出》的成败在于女主角,演员的身高、形象、气质方面必须要符合这个角色。仔细读完剧本,我觉得难度不太大;排演时,任鸣导演对我的表演也给予了肯定。

演到二十多场以后,经过不断深入地研究剧本,我渐渐发现,陈白露这个角色的内涵、难度、高度,远不止我在舞台上所表现的那样。怎么说台词,怎么演出她的性格,如何才能让这个人物更丰满,这些问题时刻在我脑海里滚动。演戏之余所有的时间,我几乎都在思考这个人物,因为深爱,所以痛苦,陈白露让我欢喜让我忧。

我搜集、阅读了大量关于《日出》的资料,写了很多关于陈白露的笔记。曹禺先生曾说过:“陈白露这个角色是有难度的,因为她是一个绝顶的好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际花。”但是,剧本赋予陈白露的多半是

交际花形象,吃喝玩乐、逢场作戏,怎么才能把“绝望的好人”表现出来?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

现在回想起陷入人物创作困境时的状态,我依旧感触颇多。陈白露在我心中是一个纯洁干净的女人,她内心充满爱,渴望美好的生活,因为感情受过伤害而误入风尘,这不是真正的她,她是一个矛盾纠结的人物,我演得很纠结,总想如何从剧本的字里行间找到她的好,演出她的好。

这个角色我一直演到现在,我几乎能回忆起她在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依然克服各种困难,坚持《雷雨》的巡演,走遍了全国多个城市,演出场次达150多场,传播了经典艺术,展现了天津人艺的风采。

戏剧大师曹禺先生是天津人,《日出》《雷雨》写的都是那个年代的天津故事,这也是天津被誉为“中国话剧的摇篮”的原因之一。我们天津人艺一直以“津味儿话剧”见长,我也先后出任《海河人家》《生死二十四小时》《俗世奇人》等“津味儿话剧”的副导演,期盼着能让“津味儿话剧”自成体系,用天津方言讲好天津故事,展现天津的风土人情。

从担任多年的演员剧团团长的岗位调整到人艺副院长的岗位,职务变了,我也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大了。我是天津人艺最后一届学员班的学员,之后我们剧院开始招收各大艺术院校的毕业生。这些演员来自全国各地,为天津人艺注入了活力,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学天津方言学得可能还不太准确。我希望能打造一种创新模式,招收一批有表演经验的天津本地人,经过正规培训,从表演水平、德艺双馨上进行考核,择优录取,充实我们天津人艺的演员队伍,把“津味儿话剧”更好地传承下去。

话剧是我一生的追求  
天津人艺就像一个大家庭

话剧是我一生的热爱和追求。2008年,我们排演古装话剧《茂陵封侯》,演出之前我母亲突然去世。剧院领导担心我承受不住,建议演出改期,给观众退票。我冷静下来思考良久,作为职业演员,没有比演出更重要的事,于是找到剧院领导:“我的职业是演员,不能因为个人情绪影响甚至终止演出,不能因为个人的事耽误集体的事,更不能对不起观众。”

平时演出,演员一般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场,化妆、准备戏,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再交流一下,导演也要再强调一下每场的要求,大家在后台有说有笑。但是那一天,当我走进化妆间,周围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大家都担心影响我的心情。剧中扮演我父亲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路希老师走过来,站在我身后,用手轻轻地按在我的肩上。那样的轻抚,在那一个瞬间,给了我特别大的力量。

演出正式开始,气氛与往日格外不同。平时演员下场后,就会回化妆间休息,但那天所有下场的演员都站在侧幕边注视着舞台。我对自己说,就冲大家对我的这份关心,我也要咬牙坚持演好。我演的那个角色也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少数民族公主,当我又唱又跳的时候,看到扮演我母亲的徐淑珍老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亮晶晶的。

那场演出过后,我更加感受到天津人艺的温暖,培养我成长的老教师,与我共同进步的同学,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相互鼓励、相互支撑。所以后来,无论外面有多大的诱惑,我都没想过离开这个剧院,就像不想离开自己的家。戏剧艺术路很长且艰辛,我会一直走下去,为繁荣天津的戏剧事业而努力。